

难以忘怀的观影印记

王崇宁

在这个快节奏、数字化的时代,我们被各种高清大屏、3d、IMAX等现代影院技术包围,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然而,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温柔的情愫,牵引着我回望那些简单而纯粹的岁月。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下,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在乡村小学读四年级的我,几天来总听一些老师和同学兴奋地说县电影院放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多么多么的好看,剧中演绎以卖花为生的乡村小姑娘花妮,如何克服重重困难,以坚定的信仰和惊人的毅力,终于踏上了革命之路,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放学路上,总有同学在讲剧中的精彩情节,这令我们穷孩子们羡慕不已。

为了能观看到这部空前轰动的电影,我们几个要好的穷孩子也在绞尽脑汁,有的说他只有5分钱;有的说想挑柴去卖了换几角钱,可柴又未干;有的说母亲不但不给钱,还不准他去,说几路路(一蹿路等于5公里)那么远,不安全……

怎么办呢?我们太想去看这场电影了。不一会儿,外号“计仔八”同学想出了好办法。

第二天刚好是星期日。我们几个各自备好烧熟的番薯或木薯作为干粮,天还未亮就偷偷地相约走了出来,哼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激情斗志的歌儿,满怀希望进军似的向县城出发了。

我们到达县影院时已近十点。刚好,正在放映的这一场很快就要放完了,我们都兴奋无比,完全忘记了疲劳。一会,影院大门敞开,人流蜂拥而出沿阶梯而下。我们则就反向迅速钻进影院中,直往



厕所方向跑。为了不轻易被人发现,几个人挤进一个卡位里,不敢多占,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待在那里的几分钟,感觉极为漫长,似乎也不觉臭味了,且个个都咬紧嘴巴,还强忍不笑,连呼吸也想屏住,就盼着赶快开场。终于等到场内关灯了,我们就高兴大方地走了出来,站在侧面的巷道中眉开颜笑地注视着前方的宽大银幕。

我们没有买票,看到旁边有位空着也不敢去坐。此时,有个女工作人员打着手电筒从旁边走过,见到我们就说小朋友还站在哪干嘛,赶快找位置坐呀。有了这个指令,我们就马上找空位置坐好。心想,天上竟掉下那么大的馅饼,我们既不用掏钱买票,又有那么好的座位坐,感到太幸运了。随之,我们就聚精会神地与剧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起来。

可才过了一会,就有几个人人声来大喊有人占了他们的座位。工作人员跑过来问个究竟,随即把我们带到影院办公室给领导处理。办公室主任了解到我们是从十多公里的大山里饿着肚子步行过来的,且没有大人陪同。虽说这行为很不好,可也觉得我们很不容易。他只是对我们简单地批评了几句后就叫我们赶快去看电影了,且还叫工作人员找来两张长板凳子给我们坐好。

返程时,我们在兴奋之余边走边谈。假若他们是不给我们观看,还转接电话到大队(现村委会)通知家长或老师来领人,那就是个大麻烦,因为那时学校抓学生的思想品德是放在第一位的,弄不好还要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书面检讨、记大过等等。想到这,我们打心底里感激那个好心的主任。

之后那段时间,我们常在同学

们面前炫耀此事,就连哥哥姐姐们都说我们太幸运了。也许是受到剧中主角花妮的影响,和遇到好心主任的帮助,令我们深受感动。渐渐地,我们懂得了一点如何做人的道理,也懂得了一点为信仰牺牲的勇气,还有,爱与被爱悄悄地在心里生根。自此,我们就在心中立志:做人要善解人意,助人为乐,要多做好事,要发奋努力,积极向上,将来要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奋斗终身!

如今,旧电影院早已被改造为商业地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对于我们那几个伙伴来说,这里的情怀却是永远镌刻在记忆之中。我们在闲暇相聚时,每每提起那观影印记犹如发生在昨天,慈祥的主任仿佛就在眼前,依旧温暖如初。

虽说现代社会瞬息万变,可总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怀念、去珍惜的。

别梦依稀慈母泪

张华文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母亲的眼泪。虽然母亲已驾鹤西去很多年了,然而母亲的眼泪还是梦里依稀可见。

母亲生于风雨如晦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化北边缘一个叫三脉沙垌的山旮旯。背枕巍峨高大的三脉嶂,村前一条小溪蜿蜒流过,一条羊肠小道与遥远的外界相连。四周葱葱郁郁,太阳迟出早归,典型的多见树木少见人。外祖父家早年家境殷实,男丁均粗通文墨。母亲没有上过学,却受文化氛围的耳濡目染。她虽然不识字,却懂得“望天数”,会计算简单的数目,知道一些历史掌故和俗谚俚语,女红针线活心灵手巧,磨豆腐、簸箕炊、做艾粿等民间小食能为人师,在村民眼里是个没有读过书的才女。

母亲未出嫁时已经家道中落。嫁到我们家后,饱经生活风雨的洗礼,不知操了多少心,担了多少惊,受了多少怕。原本也坚强自信的她,逐渐变得多愁脆弱,乃至容易伤感落泪。

最初让母亲伤感落泪的是流言蜚语的中伤。母亲嫁给父亲后不久,就风闻过村中一些好事者议论,此女聪明伶俐,绝非池中物,我们村不是她安身立命之地。传到母亲的耳朵,母亲觉得别人不了解自己。直至生育了大姐大哥,母亲携儿带女在村中出入,仍有一些见不得别人好的人背后风言风语,这个女人迟早都会远走高飞。母亲知道了这些,感到满肚子委屈和难处,常常抑制不住泪水暗流。在伤心流泪的同时,母亲笃定决心用实际行动,痛斥和回击那些小人嘴脸。当母亲儿女成行之后,那些好事者都成了村民茶余饭后的谈资。

母亲伤感落泪最多的是生儿育女的艰辛。母亲生育了十一个子女,因生活和医疗条件的贫困,夭折了三个。那时候经济非常拮据,也严重缺血少药。尤其万籁俱寂的夜间,更是祸不单行,有时遇上两个幼儿生病发烧……母亲不知经历过多少个彻夜不眠,不仅忙得手足无措,也被吓得胆战心惊,无法控制泪水流淌。母亲说,我六岁时患上角膜炎,一度双目失明;细妹到了八岁仍骨瘦如柴,像个非洲难民;弟到五岁还不会走路。当时有人认为这些孩子养不大,私下劝说过母亲放弃。母亲不但毫不动摇,反而更加殚精竭虑把我们养大成人。为了克服请医买药的困难,母亲摸索并学会了许许多多民间医学知识,用土药材和民间偏方为孩子防治疾病,如乡村常见的沙牛虫、地乌香、樟榔头包、小鸡菜以及马蹄香、山鸡菜、竹壳菜、金钱草……各种动植物药材,还有烧艾火、刮痧、拔火罐等等。母亲吃尽千辛

万苦,经历无数次惊吓流泪,我们终于慢慢长大。对家庭的管理和子女的管教,也颇让母亲大费周章和劳心劳力,甚至伤感落泪。父亲在外是生产队长,操劳生产队集体大事;母亲则是我们家庭的生产队长,操劳偌大的一个家庭事务。家庭生活的年度计划、季节安排及每月重点,母亲都会全盘考虑。年内谁该添新衣买新鞋,腾出的旧衣旧鞋安排给谁穿,母亲也会精打细算。每天谁负责家务的那一项活儿,母亲总会提前一晚筹划布置,第二天晚饭前检查落实。小时候的我调皮贪玩,时有忘乎所以耽误了母亲吩咐的活儿,或有人投诉我在外惹是生非等等。凡此种种,母亲绝无戏言,严惩不贷。什么“三岁看七,七岁看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学好三年,学坏三天”……母亲一边数落,一边挥鞭惩罚。有时不但处罚我,还有二姐或弟弟,简直像“诸葛亮斩马谡”,挨打责骂的是我们,痛彻心扉的却是母亲。我们流泪,她也流泪;有时我们不流泪,她也泪如泉涌。正是母亲“恨铁不成钢”的严厉管教,我们兄弟姐妹才会不功便成仁。

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我们都长大成人,缺衣少食的岁月已风干在记忆深处,母亲却日渐衰老,仿佛使用已久的破旧自行车,不时需要维修保养。精明能干的形象不见了,只有佝偻的背影,越来越清瘦。仿佛因长时间的担惊受怕,落下了多愁善感后遗症,喜欢唠唠叨叨,以至有时泪洒闪烁,诉说内心不尽的忧虑。她担心还在居住的泥砖房,雨天“床头屋漏无干处”;担心外出打工的两个小弟,因家里没有楼房难以娶媳妇;担心远嫁外地的细妹,因生活艰难而吃苦受累……

年老的母亲一次次在门口等待,盼望我平安回来。只有我到了门口,她才舒一口气,眼里才有一点精神。有时我周末回来,看到母亲熊猫眼的样子,我忍不住调侃:“昨晚又在忧国忧民睡不着?忧得来的,让我们年轻人不睡觉吧,你怎吃得消?”“我也知道‘人无百岁命,不作千年忧’,但怎么做不到。除非不会想了吧,我不想你们,还有什么可想呢?”母亲眼含泪花喃喃自语。每每如此,我心中总是默默祈祷:忧虑危害健康,母亲何时才能忘却“杞人忧天”啊……

直到那年南方罕见严重冰冻雨雪灾害的冬天,母亲来不及与儿女告别,就永远离开了,把对儿女所有的爱都埋藏在黄土里。直到自己也为人父母多年,我才深深地懂得母亲为儿女总有操不完的心。

每念及此,我常常热泪盈眶。

永忆江湖归白发 欲回天地入扁舟(下)

——纪念恩师劳承万先生

潘永辉



赶快慢下脚步搀扶教授慢慢上楼。先生和教授相谈甚欢,谈到了人格和学术的关系,谈到淡泊名利的问题,也谈到了招收博士生问题,教授是一位很有风骨的和蔼长者,跟先生说话也时时转头看我,目光满是爱护欣赏,我也终于放下心来,总算完成了一件事情,没有给老师丢脸。

先生也给我们讲述过他与朱光潜、宗白华、周谷城、王元化、蒋孔阳、李泽厚先生的交往,展示过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言语中充满了对鼓励和肯定过他的前辈学者和朋友同道的感激。

先生对学生的事情,事无巨细都很关心,视如家人,而且自觉实行“终身负责制”。如此尽心尽力的导师实在少见。读研期间,隔一段时间就让我们到家里聚餐,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其乐融融。当年我们硕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尤西林先生,经过一番比较“激烈”的答辩,给了我最高分第一名。先生也很开心,带我们逛桂林,游漓江。这两年,将近九十岁的年纪,回忆起过往学生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还像小孩子一样哭起来,可见对学生爱之深念之切。

先生的学术影响力也令我惊奇。先生主持中文系系务期间,文艺学学科聚集了一批游踪中青年学者,实力是很强的,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影响。我们读研究生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点,只知道自己的导师是著名美学理论家。研究生毕业出来工作,身边的同事基本上都知道先生大名,也看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们对先生的尊重,才会体会到先生在美学界的分量。先生的代表作《审美中介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产生了巨大影响,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中国美学的学术经典之一,并非风靡一时而过后眼云烟之作。在先生的学术知音眼里,先生是美学界文论界宗师级的存在。但先生长期在一所普通本科院校任教,甘于边缘,远离中心,也被敬仰者称为“学术逸民”。

不管是被视为学术名人还是学术逸民,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学界公认的。先生母校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在唁电中如是评价先生:“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文学教育家,也是我校杰出校友。他一生奋斗在中西哲学、美学和中国文化的教学、研究领域,著作等身,卓有成就,为中华文化与美学的学术研究与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劳先生的道德、文章,为海内外所景仰。他提携后学,诲人不倦,桃李芬芳。他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劳先生的严谨

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将永远嘉惠学林,激励后学。”这是全面而到位的评价,令学生们感到欣慰。

能以“嫡传弟子”的身份跟着先生做学问是幸运的。先生的学术思维博大精深,看问题往往统观全局直探根源,理论推演步步为营细致入微,具有极其鲜明的体系意识和逻辑路径,这样的学术功力非一般学者所能有。他用“逻辑建筑术”建构起来的中西美学文艺学体系,理路之清晰,分析之透彻,材料之扎实,体现出先生学术意识的高明和纯粹。这得益于先生的哲学眼光和知识积累。我刚入读大学,先生就一再跟我说文史哲不分家。当时记住了这个观念,当然也没有很真切的体会,但随着学术兴趣和学术视野的扩大,看天看地看人间,看心看物看世外,多少也有一些“意境”。从高录取到博士毕业,当我在求学生涯中依次走过历史(政治)-中文(美学)-哲学(宗教)等专业的学习旅程,也能自然而然地跟我的学生说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了。

先生很能因材施教,根据我们个人的学术兴趣和特长为我们开拓学术前途。他希望我们能接触学术大家,学有高标。毕业前,先生带我们到北京“游学”,拜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著名学者,我近距离地见证了牟钟鉴先生、陈传才先生等著名学者的学识、为人和教书育人的大家风度。过后三年我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牟钟鉴先生主持的宗教学学科的博士生,可惜由于自己的各种原因,没能赴读。

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了地方高校工作。先生对我的人生选择是有所抱怨的,他跟夫人“抱怨”:“潘永辉不够听话,要是听话,今天已经很有名望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确实太重要了,这也是先生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得出的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先生早年人生坎坷,错过许多机会,后来刻苦治学,奋发成才,期间也得到过不少前辈学者的提携,将心比心,所以对后辈学生关怀备至,一心托举学生。我读大一时先生就跟我说过,人生有两个关键的大门,一个是进大学的门,一个是出大学的门;前者决定自己的事业基础,后者决定自己的事业环境。现在回想起来,从成就学术事业的角度看,先生为学生指引的,确实是一条通向辉煌的道路,而我出大学门的门没有走好,对一生事业确实是致命的影响。年轻时懵懂懵懂,可能也有点自以为是,更主要的可能还是某种“使命感”或“命运”吧,我有我的人生因

缘,境遇一度非常难受,令人精疲力尽。但心性也在磨砺中清醒了,人生机遇错过了就错过了,也不需要去后悔。先生固然对学生抱有遗憾,却也是充分肯定学生的:“永辉博大深邃,看问题往往统观全局直探根源,理论推演步步为营细致入微,具有极其鲜明的体系意识和逻辑路径……”先生对学生也是充满智慧和自豪:“永辉是很有智慧的人……”这是先生对我人生追求的理解和认可。从学术方面看,我是辜负了恩师期望的,但另一方面,我也在继续探索着先生晚年尤其注重传统文化和心性学,因此又并没有辜负,我也自信不会辜负的。

先生逝世前十几天,我朦胧梦到先生在教书。先生逝世前几天,我在苦苦参究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是无常的?先生逝后,吾心一直抑郁不乐,深处有哭声。先生喜引王国维名句:“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晚年说他自己:“总觉得人生匆匆,学术研究也一片渺茫”、“几乎一无所得”。这是先生的诚和谦,是先生最切己的人生体验和反思,也表明先生治学由“有”归“无”,渐趋向以“空”纳万识的心性之境了。学术可以有助于安心,也可以扰心。历尽人生境况,遍尝知识滋味之后,放下未必不是清欢。毕竟无论如何,在知识的丛山中开拓,都只是在有为世界中寻找有迹之路,有迹者皆非本体,真知无知,一切所知皆可以认为是“迷”。以禅境言之,学术知识乃是浮物,可以呈现于澄澈本心,但不能代替本心,以知识为本心就是“迷”,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自觉的话,对宇宙人生的一切感知、一切所知所觉,一切探讨,一切结论都是“迷”,整个呈现出来的身心世界(以及意识所认识的“无”的世界)都是“迷”。先生主张以西学为治学手段,以中国心性之学为人生归宿。我深以为然,我已过半生之年,意识到自己治学大半生,没有得到什么真知,越求知越无知,只觉自己无知,也越来越愿意无知,想忘掉这世上一切知识,忘掉一切所知,直到自己能够忘记自己。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倘若都忘我绝学了,谁来弘道觉世?于是在忘与不忘、出世与入世之间,便须有一份自由自在的把握,先生晚年潜心探究中国传统诗学和乐学,非无因之也。

先生辞世后的几天,我脑海里总是浮现一句古诗:“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先生是化州江湖镇人,走出时是家乡的骄傲,归来时是一方水土的象征。先生身后事一切从简,骨灰归葬于家乡。这也好,大道至简,归根归静,静曰复命。谨以此文纪念先生,愿先生安息,常乐!

成功付出了心血和汗水。据曾与苏联专家一起工作的一位茂名老领导介绍,当时苏联专家来到茂名建设现场,参加加页页岩山和页岩提炼工厂的开发设计,参与由苏联进口设备的安装调试等。据“老茂名”回忆,他们工作非常认真,与茂名工人打成一片,在页岩试验工厂进行提炼页岩油试验时,苏联专家与茂名工人一起,冒着呛人的油烟在炉子上爬上爬下,收集第一手数据,研究制定提炼方案,为试验取得

茂名印记

难忘的邂逅 永存的情义

图/刘史文/蔡浩

我国“一五”时期苏联156个援华项目之一,先后有100多名苏联专家来到茂名建设现场,参加加页页岩山和页岩提炼工厂的开发设计,参与由苏联进口设备的安装调试等。据“老茂名”回忆,他们工作非常认真,与茂名工人打成一片,在页岩试验工厂进行提炼页岩油试验时,苏联专家与茂名工人一起,冒着呛人的油烟在炉子上爬上爬下,收集第一手数据,研究制定提炼方案,为试验取得